

闺阁与画舫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
江南文人和女性研究

李汇群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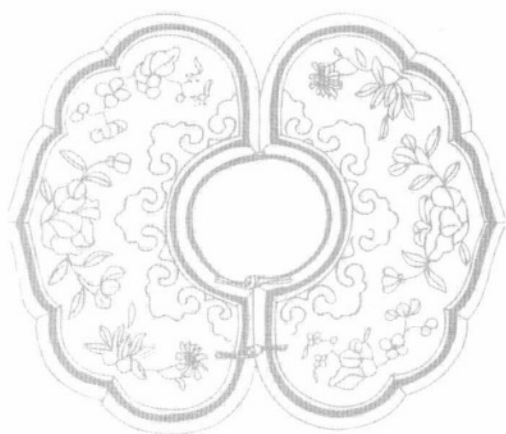
D691.7
18

闺阁与画舫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
江南文人和女性研究

李汇群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闺阁与画舫: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江南文人和女性研究/李汇群著. -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6

ISBN 978-7-81127-687-9

I. 闺… II. 李…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华东地区-清前期 ②女性-研究-华东地区-清前期 IV. 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5082 号

闺阁与画舫: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江南文人和女性研究

作 者 李汇群

责任编辑 黄松毅

责任印制 范明懿

出 版 人 蔡 翔

封面制作 大鹏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970 毫米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1127-687-9/D·687

定价: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

刘勇强

清代女性文学创作盛极一时,这是近些年广受学界关注,尤其受女性学者关注的一个课题,随着研究的展开,大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忽视女性的创作,不仅无法完整地描写清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而且可能因为这一缺失,导致对其发展原因、演变过程的简单化处理。不过,这种简单化处理也并不会因为女性创作受到的关注就自然得到克服。相反,若是孤立地研究女性创作,同样可能会影响对女性创作价值准确的判断。事实上,由于生活范围的狭窄,清代女性文学创作虽然很有特点,但是总体成就似不宜夸大。女性文学创作的意义也许主要不在其本身的艺术贡献,而在于整个文学生态乃至文化格局中的一部分,其思想与艺术价值也只有置于文学生成的环境并与相关的文学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才更有意义。显然,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与女性的关系、对女性的书写是女性自身创作的最好的参照,李汇群的《闺阁与画舫: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江南文人和女性研究》非常明智地将文人与女性的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使女性的创作与对女性的书写在相互影响的意义上,得到了更为恰如其分的揭示。

汇群是从“闺阁”与“画舫”两个角度切入文人与女性关系的,通过挖掘史料,考证原委、分析内涵,勾勒出一幅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地区独特的社会文化与文学图景。这一图景或许与重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文化的主流还有一些距离,但它作为历史真相的一部分,是我们更全面把握社会内在发展脉络必须顾及的深隐层面。嘉道时期是闺秀诗集编纂的一个高峰时期,这是不少人都注意到了的基本事实,汇群在对这一事实作了认真的梳理阐发后,又进一步强调了女性对文人及其文学活动的多方面影响,例

如在家庭生活中,母亲、妻子的文学活动都会对儿子、丈夫影响甚大;闺阁女“士”与士人的交往唱和更为普遍;而女性也更多地成为了文人书写、咏唱的一个对象和题目。其中有些方面虽然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如母亲、妻子对儿子、丈夫的影响,但因古人疏于记载,往往鲜有提及。对此,汇群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比如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在科考社会中,对于文人而言,最伤心的莫过于科举的失败和仕途的不顺。而闺阁女“士”,由自己在男性社会中的弱势位置,而能够很好地体味到文人内心的困顿和挣扎,因而出语安慰往往颇能切中款曲,委婉动人。如前文已经提到过席佩兰和孙原湘这对文学伉俪,席佩兰不仅能够在诗文创作方面给丈夫很好的鼓励,更难得的是她于夫子落第时也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其着想,予以开导劝解……有如此深明大义的夫人,无怪乎孙原湘后来会于居官不久后即辞职,并与之同隐了。像席佩兰这样的闺阁女性在当时不是个别的现象,如徐达源之妻吴琼仙也曾于徐达源入都时倾心赠言,而作为张问陶的妻子,林佩环更以“爱君笔底有烟霞,自拔金钗付酒家。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的落落赢得士林称赏。

显然,在考察男性的事功、思想时,这些生活细节并不是无关紧要的,然而往往被我们忽略了。

出于同样的思路,汇群注意到一些文学史上一向受到冷落的人物,如车持谦、陈裴之、蒋坦等。眼光的下移,将重心转向二、三流的作家,是近二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倾向,其得失不可一概而论。由于名家名作研究已趋于“饱和”,当研究者感到难以置词时,便不得不别觅洞天于荒郊野径,其劳作虽可能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有时却也不免夸张其事或故作惊人之语。不过,汇群之关注文学史上次要人物倒并不只是因为前人鲜有涉猎,足以申论。更重要的是,这些各具特点的研究对象,有助于从不同角度展现清代文人的女性观念及相应的女性书写。所以,她在“结语”一条小注说,她并不完全认同“第二流”“第三流”的说法来指称“大家”之后的其他文人团体,说到底,文学作品的流传也是一种偶然和必然结合的结果。在“当时”的平面上,文人团体中彼此认同和划分的标准,往往和后世有着很大的差别。我赞赏她的这一观点,也赞赏她由此展开

的分析。当一个研究者摆脱了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后,就有可能在纷繁的现象中,提炼出真正具有理论涵盖意义的结论来。汇群对所谓“真情”与“幻情”的剖析,就是如此。大而言之,她指出从晚明到嘉道二百年的时间,文人对“福薄才女”的书写,将其普通现实的人生涂上种种幻美的色彩,这种种“修改”或者说“伪造”中折射出来的其实是文人自己内心深处的自我痛悼。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文人的青楼书写中。小而言之,她指出陈裴之《香畹楼忆语》对文字本身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对紫湘本人的悼念,使得真情经过发酵和夸张成了服从于行文需要的一段幻情;而蒋坦《秋灯琐忆》空灵隽永的文字与他和关锬真实生活之间存在着的差距,折射出来的蒋、关二人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等等。如此洞幽烛隐的分析,不仅需要对文献作艰苦的披检与考证,还需要有基于对社会历史准确把握的精确解读与阐发。

因此,汇群此书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她注重关系、过程、细节的揭示而不是单纯的价值判断,对于拓宽研究领域,在方法上是值得借鉴的;二是她对诸多史实的考证,不但多有纠偏正误之处,同时也为还原清中叶的文学现场,提供了很多精彩的片断。三是作为女性研究者的敏锐细心,使她常能透过诗文的表层叙述,揭示出人物关系深隐的心理因素。比如文中指出“冯小青”故事在嘉道时期的流行,文人和女性理解的角度各有不同,以致在相同的书写符号中,有着不同的投射与寄寓,就独具神解。这些胜识新见,读者未必都能认同,但从中获得启发、引出商榷,应当是无可否认的。

汇群自北大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去了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工作,与她原先所学的古代文学专业似乎有些距离,但她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要求,这使我想到了《儒林外史》第十一回中鲁编修说的:“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这番高论套用了朱熹的原话,用在八股上自属夸张。但若就一个人所具备的优良的研究素质来说,却是不错的。大约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信念,汇群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学术兴趣。这肯定也有助于她今后的工作。

2009年4月1日于奇子轩

目 录

序 / 1

绪 论 / 1

上 编

第一章 嘉道文人与闺阁伴侣 / 17

第一节 文人对闺阁之奖掖 / 18

一、闺秀诗文集的编纂 / 19

二、袁氏五女的交游唱和 / 27

三、其他文人的奖掖师从活动 / 31

第二节 闺阁于文人之影响 / 36

一、以家庭为单位的唱和和鼓励 / 36

二、闺阁女性对文人的理解与支持 / 42

三、作为“书写”对象的闺阁女性 / 45

第二章 嘉道文人与画舫冶游 / 50

第一节 画舫冶游的文人群体钩稽 / 51

一、南京 / 51

二、苏州 / 62

三、扬州 / 72

第二节 画舫冶游在嘉道时期的出现 / 73

一、晚明青楼文化传统的接续 / 73

二、烟花业在嘉道时期的兴盛 / 79

第三节 画舫冶游影响于文人创作 / 89

一、文人题赠 / 89

二、《风月梦》:以“城市”为中心的狭邪小说 / 96

三、仕女画家与画舫冶游 / 103

第三章 符号·投射·寄寓

——嘉道文人的女性书写观念 / 109

第一节 从“仆本恨人”谈起 / 112

一、嘉道文人的“恨”意剖析 / 112

二、泛文与泛情 / 121

第二节 “才女”与“名妓”:文人社会的流行书写 / 127

一、薄命才女 / 127

二、名妓 / 136

第三节 投射和寄寓 / 143

一、小青如镜:对女性投射的解读 / 144

二、文人的寄寓:自怜与惜花 / 152

下 编

第四章 车持谦及其“画舫”系列 / 169

第一节 “捧花生”其人其事考 / 169

第二节 《画舫》系列对《板桥杂记》的继承与新变 / 173

一、纪人与纪地 / 174

二、对清初历史的重新思考 / 177

三、想象与书写的矛盾 / 180

第三节 青楼书写的背后:理想与策略 / 184

一、“种情人”与“传情笔”的理想 / 185

二、由色悟空的书写策略 / 191

第五章 陈裴之的真情与幻情 / 196

第一节 用世之志与入世之痛 / 196

一、立志与科考 / 197

二、求仕与经济 / 200

三、幕游与幻灭 / 207

第二节 闺阁唱和的真情 / 212

第三节 求文名之幻情 / 222

第六章 蒋坦和关锬 / 232

第一节 由《秋灯琐忆》的创作年代引发 / 232

第二节 蒋坦、关锬身世及交游考 / 235

一、家世出身 / 237

二、师承长辈 / 239

三、朋友交游 / 243

第三节 虚构与逃脱:蒋坦关锬婚姻生活的正反面 / 250

结 语 / 266

参考文献 / 268

后记 / 277



绪论

一

性别研究是近年来的重要学科之一,已经渐渐渗透到了人文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在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文学研究方面,也渐渐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段时期女性社会活动环境的变化及其在女性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具体来讲,近年来明清文学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和清朝中期。如孙康宜的《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从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脱出,将全文的重心放在陈柳二人的诗词唱和中,借以勾勒出明清之际女性,尤其是江南名妓生活环境的大变动。钟慧玲的《清代女诗人研究》和《清代女作家专题》,以翔实的资料还原了清代女诗人活动的社会背景,并采取个案分析的方法,对明末至清代中期的几位重要女诗人,如王端淑、汪端、席佩兰的文学创作做了重点分析。黄嫣梨的《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中提到徐灿、顾春、吴藻和吕碧城,顾春和吴藻都是清代中叶重要的女词人。陶慕宁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意在探讨青楼文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对明末江南名妓与文人的关系给予了更多关注。鲍震培的《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虽然写的是清朝一代弹词的创作,但考分析重点,如《天雨花》、《再生缘》等,视野明显地集中于清初至中期一段时间。杜芳琴的《痛菊奈何霜:双卿传》,对清代中期女词人贺双卿的生平及创作做了详细的考证。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和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是近年编选的两本较好的古代文学性别研究论文集,《古代女诗人研究》中收入清代研究论文16篇,其中主要谈到明清之际和清代中期的有12篇,比例高达3/4,《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中收入论文54篇,

关注明清之际和清代中期的论文则有近 30 篇。由此,都可以看出近年明清文学性别研究关注的中心和热点所在。

本书研究范围为清代嘉庆道光时期(1796—1850),仍然属于清代中期这样一个大范围。就笔者所见,现今清代中期性别研究仍然更多集中在女性与重要文人的交游及相关作品的梳理方面。如钟慧玲的《清代女诗人研究》和《清代女作家专题》,在清代女诗人活动和创作的材料搜集方面堪称翔实,于清代中期则拈出“随园女弟子”和“碧城仙馆女弟子”的活动,作了清晰的勾勒。王英志著《袁枚暨性灵派诗传》,对“随园女弟子”的交游作了详细论述。严迪昌著《清诗史》,辟出专节论及“随园女弟子”及汪端,而邓红梅的《女性词史》中论及“万花为春的清代中期词坛”,所谈到的重要女词人,如李佩金、杨芸、张玉珍、王倩、吴藻等,都与随园和碧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说清代中期的女性研究或者性别研究目前更多地聚焦于袁枚、陈文述和他们的女弟子,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今研究者在还原清代中期女性文学活动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笔者感觉这些研究更多还是停留在现象的表面,如钟慧玲分析清代女诗人兴盛的原因时列举了“晚明文学环境的酝酿”“清代文学风气的影响”“清代文人的奖掖”“官宦世家的提倡”等因素,搜集材料不可谓不细,却缺乏对材料深入的分析。又如黄嫣梨的《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分析从清初徐灿到清代中期顾春、吴藻词的变化,条分缕析,考证翔实,但在谈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时,也仍然从时代氛围的变动来展开论述,并没有更多深入的发掘。而且,现今关于清代中期女性乃至整个清代女性文学的研究,仍然只是停留在若干已经提出的重要人物上。就研究时间而言,不同于明末清初的是,清代中期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Susan Mann 甚至将清代中期的时间划分为“Long Eighteenth Century”(1683—1839),跨度长达 150 多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背景下来观察研究对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能够连贯地把握住研究对象的变化,如她将“十八世纪”女性文学兴起的背景总结为“清政府的政策”“满汉地方官员的政策”“考据学的兴起”“商业、竞争和流动”“人口增长”“人口迁徙和流动”等六点,应该说也的确部分地感觉到了清代中期的特殊脉动。但文学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讲,是人的历史,150 多年的时间在研究者的眼中是一个抽象的研究范围,于当时人而言却是具体的生活环境。以 20 年为一代人来计算,150 多年的时间有七代人生活在“长江下游”(Susan Mann 语)这样一个具体环境之中,从康熙到道光,从时代的大变动到个人生活

际遇的变化,丰富的人生似乎不是这么抽象的历史可以简单概括的。这也是本文立足于“嘉道时期”来展开研究的原因。

嘉道时期在清代历史上是一个特殊时期,一般认为它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影响于江南地区^①,人口的持续增长,考据学的渐渐退潮,科举的日益艰难,使得士人心态普遍趋于萧瑟寒缩。^②举例言之,卢见曾和曾燠先后在乾嘉时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任职时期为乾隆二年(1737)至三年(1738),乾隆十八年(1753)到二十七年(1762),曾燠任职时期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到嘉庆十一年(1806)。二人都矜尚风雅,喜好延揽文士,卢见曾的幕府和曾燠的幕府是清代幕府中两个重要的亮点,而二者的成果、影响则完全不同。卢氏幕府喜好编书,刊刻了不少汉唐以及清代的经史著作,对保存古代文献,推动汉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曾氏幕府则仅有一部《邗上题襟集》传世,且中多寒咏苦酸之语,与盛世气象殊不相符^③。其原因则是曾府“才人常下第,此地往来多”^④,客观上已经成为了落第文人排解苦闷,消磨时光的地方。仕途坎坷,功名梦断,当“立功”已经变得遥不可及,“立德”看起来又那么的虚无飘渺,嘉道文人的生活重点渐次转移,对自己的文字给予了更多的热情。康正果提到“在这古典诗歌本身已经资源衰竭的最后阶段,诗词的写作、出版和传播却在数量和广度上超过了从前的任何朝代”,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物质因素是“十七世纪以来江南出版业的发达和商业化”^⑤。那么,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精神因素终究还是要归结到其时士人的深层心理状态。

① 关于“江南”的地域划分历来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江南”,“是指长江以南属于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各府及太仓直隶,以及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各县。”(见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页。)又如李伯重认为“就明清时期的情况而言,江南地区的地域范围应限定在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应天)、杭州、嘉兴和湖州八府以及由苏州府析出的太仓州这八府一州组成的地区。”(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19页)。本文采用此种划分界限,将“江南”限定为八府一州及扬州地区。关于扬州的江南文化特性,见陈晓燕,包伟民:《江南市镇:传统历史文化聚焦》,第16页。

② 陈玉兰:《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第75页。

③ 陈玉兰:《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第77—78页。

④ 曾燠:《题吴退庵之粤西》,《赏雨茅屋诗集》卷三。

⑤ 康正果:《泛文与泛情》,见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二

如上文所述,目前关于清代中期的女性研究集中在“随园女弟子”和“碧城仙馆女弟子”上,但又没有更进一步地深入。随园与碧城二人为乡里,互为先后地在清代中期发扬女学,褒奖女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两人虽然是浙江人,但一居南京,一居吴门,活动的范围辐射到了整个江南地区,其流风直至清末,影响不可谓不大。可以说,离开了随园和碧城,则无从探讨清代中期的女性文学,而目前有关二人的研究还只进行了第一层面的搜罗。如袁枚研究一般只截止到他生前,于其身后之影响则发掘不多。事实上,文学现象有着其自身的惯性在其中发挥作用,其人虽已没,而数载或者数十载之内,风流余韵却依然不绝其缕。如关于随园女弟子,一般只谈到他本人所认可或提及者以及袁氏三妹,而事实上,在袁枚逝世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至少以南京为中心,随园的风光却一如往昔。这不仅表现在后一辈(其孙女辈)袁氏闺秀们的继续创作方面,还反映在以袁枚嗣子袁通为视角的南京文人与闺秀以及名妓的交往上。对陈文述来讲,一般只谈到他的女弟子和儿媳汪端,对于围绕在他周围并直接受到他影响的直系亲属则基本不曾提及,包括他的独子陈裴之、女婿叶廷琯和堂兄陈鸿寿。而陈裴之等的人生经历、文学创作以及和女性之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比陈文述更能表现出嘉道时期文人的特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并且,清代中期奖掖妇女文学的文人并不仅仅只有袁枚、洪亮吉、陈文述等人,那是一个时代的风气。虽然也有章学诚之类的正统派对之不以为然,但流风所及,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中提到的乾嘉时期影响甚大的不少诗人,其文集中都不乏与闺秀或者名妓唱和的作品。真实的文学史本身,或许不像现在所展现的那般,只是袁枚与陈文述在唱双台戏。换言之,如果把清代中期奖掖女学的文人群体比作一座冰山,那么袁枚和陈文述只是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水面之下的人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们的所思所为,和袁陈是否有不同,这种不同之中又折射了什么,或许才是下一步研究更应该关注的对象。比如郭麐,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称之为“浪子”,乾嘉之际重要诗人的集子中几乎都提到与郭麐的交游唱和。其《灵芬馆全集》中关于女性的书写和论述也占到相当比重,可迄今为止,除了钟慧玲在《清代女诗人》中提到郭麐对女学的奖掖外,其他都无提及。这种研究的薄弱和其人在清代文学性别

研究中所应占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而当前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则应是重新还原个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又如嘉道时期是女性文集编纂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将文学创作看做一种生产,把文学产品的流通完全纳入研究视野,是近年来小说研究的热点,^①事实上这一研究角度也适合于女性研究。对于闺秀而言,处于女性基本与社会隔绝这样一种状态中,从文集作品的编纂、出版方面来讲,女性周围的文人对她们的帮助自是毋庸置疑。郭蓁曾撰文分析男性文人对女诗人的提拔和支持主要有六种方式:“为女诗人诗集作序和题词”“为女诗人刊刻作品”“招收女弟子,指导她们的诗歌创作”“在诗话类著作中着意存录女诗人的经历和作品”“编辑诗歌总集时,为闺秀诗人留有自己的位置”“对于同女诗人唱和酬答的作品加以整理并收入文集中”^②,已经间接提到了女性作品流通和文人的关系。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更多角度,探讨嘉道时期文人对闺秀文学的揄扬。

任何事物都是双向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讲,闺秀对文人的影响何从表现呢?清代闺秀文学发展有着明显地域性和家族性的特点,闺秀在为人女,为人妻,为人徒时受到文人的鼓励和奖掖,而部分才华高绝的妻子同样会对丈夫的人生以及文学生涯产生相当的影响,如席佩兰之于孙原湘。而闺秀作为母亲,其言传身教,对于文人的影响可谓关乎一生。更重要的是,明清时期文人题咏的风气盛行,大到国家政治,小到生活琐细,无不成为题咏的对象。选择“女性”作为题咏的对象,在嘉道文人“泛文”的风气下,表现得也很突出。礼教的细微总是表现在各个方面,就“闺秀”这一指称而言,母亲、妻子和妾氏的身份迥然不同,这种不同在文人的题咏中都有所表现。“闺秀”成为了文人题咏的一个对象和主题,在连篇累牍的词语罗织中,文人们最后对文字的关注和迷恋往往超过了他们歌咏的对象本身。

谈到清代的女性文学,目前的研究者似乎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传统的青楼文学到了清代已经风光不再,清代是闺秀一统天下的时代。如鲍震培提到“明代青楼才女能诗属文,这本是中国青楼女性文化的传统,但同时闺阁才女的力量也在积聚,并于明末清初成为新传统而取代旧

① 如陈大康的“中国小说史”系列,包括《明代商贾与世风》、《明代小说史》和《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等。

② 郭蓁:《清代女诗人研究》,北京大学文学博士论文 2001 年。

传统”^①。又如 Susan Mann 在她那本著名的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中提到恽珠“同时要求她自己对于古典主义的权威,把自己和晚明的女性书写疏离开来,发出盛清时期女性作者的声音”^②。所谓“盛清时期女性作者的声音”,是指恽珠在编选《国朝闺秀正始集》时,明确提出“青楼失行妇人,每多风云月露之作,前人诸选,津津乐道,兹集不录。然如柳如是卫融香湘云蔡闰诸人,实能以晚节盖,故遵国家准旌之例选入附录以示节取”。闺秀和名妓的分野,或许早在明末方维仪编《宫闺诗史》时即已出现,方氏将《诗史》分为“正”“邪”两编,今虽已不见全稿,但王士禄在《然脂集例》“区叙”中针对《宫闺诗史》区分二集时说,“方夫人《宫闺诗史》、《文史》二书,并有《正集》《邪集》之分,虽义存劝惩,实不必然。尼父编《诗》,《柏舟》与《墙茨》联章,《鸡鸣》与《同车》接简,贞淫并列,美刺自昭,固无事区别也。故此书(按:指《然脂集》)编叙《宫掖》、《戚畹》、《闺秀》、《女冠》、《尼》、《妓》之外,不复更立“邪”“正”之目。”可见“正”“邪”应该是指闺秀与名妓的分别。此后山阴王端淑编选《名媛诗归》,将闺秀列入“正”类,青楼列入“艳”类,较之方氏名虽有别,而其实则一。由此可见,作为名门闺秀、令子之母的恽珠将青楼创作从其选集中剔除出去的做法是其来有自。如果说恽珠的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闺秀对青楼的蔑如,而持这种态度的“闺秀”在清代中期占到多大的比例,当时的文人是否持相同看法呢?如果不能回答这两个问题,则闺秀与名妓在清代的分野这样一个命题是否能够成立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事实上,就闺秀而言,现在看到的材料,如《浮生六记》中芸娘与憨园结盟,袁氏姐妹的诗集中提到随园集会时有金陵名校书参加,又如吴藻的那首著名的赠青林校书词,似乎都说明了清代闺秀与名妓的交往,如果说的确比不上晚明,但却也不像现今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二者之间壁垒分明,互为楚汉。但最重要的,还是文人的态度。相比晚明,清代中期的文人对闺秀和名妓以及她们的创作持何种态度,是探讨名妓与闺秀分野问题的关键所在。而清代中期记载妓女轶事的笔记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晚明,对于这类笔记,过去提及不多,即使谈到,评价也不

① 鲍震培:《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第35页。

②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p. 98.

高。^①姑且不论这些评价是否恰当,清代中期文人的冶游,对名妓的吹捧,比之晚明有过之而无不及则是事实。近年来随着性别研究的兴起,西方汉学界开始慢慢重视清代中期的这批笔记。如 Susan Mann 在其著作中专门辟出了一章来探讨清代妓女,其研究基本建立在这批笔记之上。孙康宜在其编选的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中也将这批笔记列为重要参考书目。而陶慕宁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中探讨“顺治迄道光间的青楼文学”,立论也基于这批笔记。但由于这批笔记的作者多用字号署名,在文中讲述他们的冶游时也多用代号,倘若对其中的人名不作详细考证,则通过这批笔记探讨清代中期文人的冶游生活及名妓文学只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或许这也是现今研究者将之搁置一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当对清代中期文人与女性的研究已经进行到了一定程度,对这批笔记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的活动的考证已经初见成效的时候,^②这批笔记在还原和进一步研究清代中期女性文学方面,尤其是青楼文学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清代中期为什么会出现数量如此之多的狭邪笔记?

① 参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08页。侯忠义、刘世林著《中国文言小说史稿》,第351页,第354页。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第213页。

② 如笔者经过考证而知《秦淮画舫录》的作者为车持谦(秋龄),《吴门画舫录》的作者是董鳞(竺云),《吴门画舫录》的作者是程开泰(韵簪),《秦淮廿四花品小传》的作者是秦耀曾和凌志珪。而从乾隆晚年直到道光时期,据这批笔记所载,活跃于江南风月场中的文人包括以陈文述为中心的吴派文人,如陈鸿寿(翼庵、种榆道人)、陈裴之(小云)、沈廷炤(镜卿)、郭麐(频伽)、陈基(竹士)、曹楹坚(或赵函,两人同字良甫)、周笠(云岩)、稽集虚、稽天眉、王文治(梦楼)、马燦(云题)、吴堦(次升)、张若采(子白)、刘嗣绾(芙初)、郑梦白、刘开(孟涂)等,和以袁通(兰村)、车持谦为中心的南京文人,如汪世泰(紫珊)、汪度(白也)、王嘉福(七夕生)、严骏生(小秋)、谈承基(念堂)、蔡世松(友石)、吴国俊(紫瑛)、崇一颖(云根)、金惠恩(雨香)、马士图(菊村)、欧阳炯(棣之)、侯云松(青甫)、方宫声(子固)、罗凤藻(抑山)、周介福(竹恬)、杨文荪(芸士)、万承纪(廉山)、钱杜(叔美)、改琦(七芗)、袁棠(湘眉)等。而汪世泰为袁枚女婿,车持谦继妻袁青,崇一颖妻袁嘉,吴国俊妻袁绶都为袁枚的孙女。文人、闺秀、名妓常常集中于随园唱和赋诗,是当时南京的一道风景。郑梦白是嘉道时期弹词女作家郑澹若的父亲,侯云松是侯芝的哥哥,梅曾亮的舅舅。秦耀曾妻毕还珠,是毕沅的女儿;凌志珪父为凌霄,是南京诗人,著有《快园诗话》,为毕沅的幕僚,与陈文述、陈裴之父子过从甚密。

从时代的大背景来看,与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是密不可分的。人口的增长加剧了生存竞争,因生存压力而走乡串巷,转徙他乡的孤独将中下层的男性驱向花街柳巷,离开此,则难以解释狭邪笔记在清代中期的突如其来。而清代中期江南城市文化的发达和晚明风流的流绪则从内容到形式,在这批狭邪笔记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如分别代表南京、苏州、扬州江南水乡特点的《秦淮画舫录》、《吴门画舫录》及《续录》、《雪鸿小记》,和这些笔记中流露出来的对晚明韵事深深的怀旧情绪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地域文化和文化传承的特征。为什么怀旧?为什么一边说着嘲风弄月无伤于君子大雅,一边又将自己的姓氏深深埋藏在种种匿称之后?其间折射出来的是嘉道文人的特殊心态。而文人的画舫冶游,对他们文艺创作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这批笔记不仅是珍贵的史学材料,其用笔遣词之清倩婉丽,也可将之作为文学作品来解读。又如邛上蒙人的《风月梦》,无疑是花场冶游的产物。又《续板桥杂记》中载杨瑛昶为二汤作有《双珠记》传奇,《画舫余谈》中云倪远孙为韵仙作有《河亭送别》院本,都是名妓于文人创作直接影响的产物。《秦淮画舫录》中记载了大量文人对名妓的题赠,袁通、汪世泰、汪度等人的文集中也多有赠妓、咏妓之作。又如嘉道时期著名的仕女画家,改琦和钱杜,活跃在江南的风月场中。改琦的《少年听雨图》正是反映了青年时期花场冶游的经历,同时文人对之多有题咏,他的《玉壶山房词选》中有大量题仕女画词。作为画家,改琦对仕女画有着独特的看法,这种特点在他的题画词中都有所反映。花场冶游的经历,对以他为代表的江南仕女画家文艺创作的影响何在,到了何种程度,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又次,如上所言,侯著和陶著都认为狭邪笔记的记叙是文人空虚无聊的一种表现,文人的空虚无聊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选择对妓女生活乃至对整体女性命运的关注为其中一个宣泄口,他们的这种关注,是否在更深程度上传达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苦闷?笔者以为,有必要探讨一二。对于文人与女性交往的深层心理,现今研究清代中期女性的学者也有过一些论述,如康正果在《边缘文人的才女情结及其所传达的诗意:〈西青散记〉初探》中指出,“一方面,文人站在‘爱才’的优越位置上同情福薄的才女;另一方面,可以更从容地‘借他人之穷愁,以供我之咏叹’。这就是他们倾向于大谈‘才女福薄’或把文学轶事中的才女写成福薄的原因。”^①康正

① 见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